

重阳金融研究院庞中英
中国能挽救 G20 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庞中英在发言时指出,2016 年如果中国举办 G20,是 G20 重新出发、塑造 21 世纪的世界秩序的历史性机会。中国需要不失时机地推动 G20 成为 21 世纪的大国协调的主要安排。

庞中英首先讲到,G20 是大国协调的一个理想模式。或者说,G20 为 21 世纪的大国协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框架、平台。这个框架从消极的角度看,不仅可以让大国在共同的危机面前“同舟共济”,而且可以管理、控制大国之间的冲突;从积极的角度看,可以实现大国之间的深度、全面的合作,甚至形成真正的共存共荣、多元复合的新世界秩序。

随后,庞中英从美欧联合围堵中俄的角度阐释了 G20 的危机之所在。他说,在度过了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后,G20 如同其它一度特别重要的多边论坛,也逐渐丧失“外交势头”。俄罗斯虽然在 2013 年“成功”轮值了 G20,但并没有能挽救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和平融入建立在自由市场和民主基础之上的西方世界秩序的希望已经落空。”而澳大利亚(2014)和土耳其(2015)将主办 G20,如同韩国(2010 年主办 G20),这些在世界秩序中的“中间强国”也许还不足以带动 G20 找到新的方向,更不可能挽救 G20,因为这些国家无法让美俄、美中之间避免冲突。

那么中国在 G20 中又将起到什么作用,是拯救 G20,还是转型 G20? 庞中英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从意图和意愿上看,中国不是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发动一场取代美国和欧洲主导的自由秩序的竞争;中国也不是与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分庭抗礼,联合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另起炉灶。中国的对外战略实际上是两种东西的混合:在旧的美国、欧洲主导的自由秩序中,改革这一秩序,使这一秩序更具有全球性质,更加合理;另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力图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者。G20 正好是这样一个平台。从中国的角度看,G20 如何成功,才代表了现实的可持续的世界秩序。他同时指出,2016 年如果中国举办 G20,是 G20 重新出发、塑造 21 世纪的世界秩序的历史性机会。中国需要不失时机地推动 G20 成为 21 世纪的大国协调的主要安排。G20 这一平台极其有助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极其有助于世界重建与中国的关系。

印度智库默罕默德·萨奇布
西方大国发现自己无知



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默罕默德·萨奇布在发言时指出:G20 象征着一个历史性转折——它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与西方国家一样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标志着长达 500 年的西方主导地位结束。当美国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后,自诩为“大师”的 G7 发现自己比他们眼中的“弟子”(新兴经济体)更无知。

他认为,G20 作为讨论国际经济问题及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国际论坛,其作用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尚未完全意识到地缘政治与格局变化所带来的潜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隐患。他强调,从经济上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 2025 年或之前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也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潜质,这些国家的经济潜力和庞大的人口赋予其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此消彼长的不平衡长期存在,势必导致逆差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负债,并最终演变成金融和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G20 拥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弥补全球治理的空缺。但对 G20 而言,国际体系的重组不仅意味着合作,同时也为其成员国提供了角逐权力排名的大舞台。

同时,萨奇布指出,G20 需要反思取得的成绩低于预期的原因,并着重介绍了 G20 的金融改革和发展议程两方面。他说,G20 议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金融体系改革。但目前财政整顿和金融改革明显深度不足、速度缓慢,缺乏执行力,需要各国共同推进。而发展议程起步较晚,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安全方面需要发达国家给予更多援助,G20 需在其中更多的参与斡旋和监督。

据了解,穆罕默德·萨奇布教授是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的创始人并担任秘书长职务,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是中印经济和文化问题的重要智库。

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
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该校重要智库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陈雨露教授首次提出 2016 年中国申办 G20 首脑峰会,更加印证了召开此次论坛的重要性。与会嘉宾,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在发言时指出,世界性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是恢复强劲增长的关键。由此建议由 2014 年东道国澳大利亚主持,成立“贸易 20 行动计划”(Trade 20 Action Plan)。

他说,由于新兴经济体近年的增长滑坡,其内部的结构改革效果不佳,以及发达经济体市场环境的恶化,单纯靠财政和货币刺激,不可能恢复可持续的较快增长,G20 成员国的各种举措与改革很难保证实现 5 年内 GDP 整体多增长 2%的目标。

他认为,历史证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和兴建,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长足进步。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

土耳其金融人士尤科赛尔·戈迈兹
打造利率走廊,防控金融风险



土耳其中央银行北京经济参赞尤科赛尔·戈迈兹,是一位专业的金融人士。他以土耳其央行的金融治理为案例,详尽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特别是央行货币政策的运营方案如何应对货币市场短期剧烈变动中的得失,并且介绍了土耳其央行打造利率走廊防控金融风险的努力。

戈迈兹回顾了上世纪 90 年代土耳其混乱的金融治理下带来的高通胀、财政失衡以及并不稳定的增长实践,这种失败的治理模式直接导致了

1994 年 1 月的土耳其里拉挤兑风潮,加剧了金融动荡。他认为,土耳其采用过各种形式的货币制度,从货币目标制、实际汇率目标制到有限浮动汇率制。以增长和通货膨胀指标测量,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一个全然失败的十年。中央银行和国库融资遇到诸多挑战,曾经有一段时期,每个月举行的借款拍卖活动超过 14 次。单月的短期利率报价变化曾一度超过 40 次。在这种极端条件下,货币政策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在多年动荡后的价格稳

大而迫切的瓶颈是基础设施建设大量欠账。G20 应当超越现行机制,用机制创新补充现有机制的不足,发挥自己独特的统揽全局的作用,力争在中期内成为推动世界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机制。

何伟文同时指出,继续强力推进自由贸易,将是经济增长提升 2 个百分点的又一个核心动力。因此建议成立“贸易 20 行动计划”(Trade 20 Action Plan),由 2014 年东道国澳大利亚主持,具体任务是:协助 WTO,跟踪 G20 集团各成员国落实该协定的进度和问题,在 G20 官网上公布,相互监督和促进;跟踪 G20 集团各成员国新出台贸易救济措施的情况,并通过领导人协商机制帮助双边协调;每年举行一次 G20 成员国官产学研参与的贸易便利化论坛;跟踪研究主要的区域、诸边和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特别是 TPP、TTIP、RCEP 和 FTAAP,寻求包容性、有区别待遇的各类安排,与完善 WTO 多边自贸协定的谈判和机制相向而行。并向 WTO 和各相关国家政府提出建议,为 WTO 多边自贸协定的发展添砖添瓦,而不是使之碎片化。

OECD 安德里亚斯·沙尔
2015 失业率将下降至 7.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G20/G8 谈判代表办事处主管安德里亚斯·沙尔在发言时指出,制定全面发展战略,实现更强劲的包容性发展,截至 2015 年,在全部经合组织成员国地区,失业率预计会略下降至 7.1%。

他说,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心骨,二十国集团采取迅速、果断和统筹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宏观经济方面,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本次危机使国际合作和多边合作变得更为重要,尤其在竞争、贸易、就业、全球价值链、投资等领域的政策改革将大力提升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

他认为,生产力是保持长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从中期来看,为发展生产力,须在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激发更灵活的企业为分配资源进行更激烈竞争等方面取得进步,并激发创新。为此,须对竞争、贸易和投资等关键性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

沙尔同时指出,仅仅注重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还不够,如想得到长期持续发展还需注意包容性。因此,20 国集团国家应改为注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改革。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我们需要刺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就业率,使更多的个体加入劳动力市场,注重弱势群体,增加人员技巧投入。20 国集团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就能设计出即高效又全面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使各国经济发展强健、持续、稳定和包容的目标。

土耳其智库萨普·卡尔坎
全球网络建设应去美国化

在谈到 20 国集团应怎样加强不同国家间的相互连接时,土耳其商会及商品交易所联合会会长经济政策顾问萨普·卡尔坎特别强调的是,2013 的斯诺登事件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立采用的是一种极端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模式。新兴市场国家之间连接程度以及它们在互联网治理机制中代表权与它们在全球互联网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份额是不相称的。据波士顿咨询集团调查显示,20 国集团的互联网经济总量为 23 万亿美元,占 20 国集团国民经济收入总额的 42%。20 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体有 8 亿互联网用户,超过 20 国集团中所有发达国家的互联网用户总和。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兴起引发了人们对基础设施投资和治理领域许多问题的讨论,包括对数据中心和电缆投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个人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问题的讨论。

除了在互联网建设方面去美国化以外,卡尔坎强调 20 国集团可以做到如下四点以增强联系:1、确定并敦促其成员国遵守有关标准;2、携同国际组织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评估和次序安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各成员国履行其承诺的责任心,支持各成员国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3、将在建立和协调区域发展基金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吸引私营部门对项目融资的参与;4、领导跨境公私合作模式的发展并制订相关准则,以激励私人投资者(开发者)承担此类复杂项目。

澳前高官迈克·卡拉汉
要监督履行全球
经济再增长 2%的目标

来自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 G20 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卡拉汉对 G20 所达成的全球经济再增长 2%的目标并不乐观。不过,他仍然认为,G20 必须证明其将如何履行承诺负起责任。

由此,他提出了 G20 需要努力的几个方向。首先,G20 需要寻找到有效的国际经济组织来实现其目标。由于 G20 不是一个组织,没有常设秘书处,因此它需要有效的国际组织来推进其承诺和实现其目标,特别是应该努力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治理改革,尝试改变这些组织的配额和股权安排,以更好地体现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

其次,G20 应当加强国际组织的监督作用。G20 可以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参会,以此增强这些组织的有效监督,从而在监督制定和实施国别经济增长计划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进程被拖延,这很不幸,不仅令人沮丧,也损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G20 的可信度。因此,G20 应采取主动,确保未能推进治理改革不会影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行,尤其要保证该组织的监督公正,不偏袒任何国家群体。

卡拉汉还提出了改进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具体治理措施。他认为,G20 需要改进金融监管问题的监督,包括明确其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关系。尽管金融稳定委员会重点是在新监管措施的细节,设定采纳措施和监督实施进程的时间表,但是 G20 应处理高层次问题,例如制定新标准的优先程度是否适当;监管措施可能带来的金融体制结构变化;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平衡的进程,以及是否有意外结果。

巴西学者吉雅·莫拉·科斯塔
对 G20 的质疑是不正确的



巴西圣保罗商业管理学院(FGV-EAESP)教授蕾吉雅·莫拉·科斯塔在发言时指出,尽管存在对二十国集团合法性、效率及有效性的质疑,但二十国集团目前仍是应对由全球多极化所带来复杂国际形势的最佳对话机制。

科斯塔称,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崩溃之后,外界对于二十国集团的作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有些人对二十国集团的非正式结构提出了批评,

也有人认为,该集团的构成完全不符合任何明确标准,既不是按人口规模,也不是按经济规模或者 GDP,成员选择过程的合法性也存在可疑之处。

但科斯塔强调,如今七国集团和八国集团被降级为其他国际论坛,而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他国际治理机构因二十国集团的出现而居于次要地位。二十国集团之所以能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一方面是二十国集团规模很大而且多元化,

足以完全反映当今世界的多极化特点;另一方面,二十国集团又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的联合,使得各成员国之间能够发展关系和建立信任,从而实现成功合作。在过去的五年中,二十国集团努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并为增强现有国际机构的多样性提供了框架,它帮助并引导世界走出经济和金融危机,度过了全球复苏的初期阶段。

科斯塔说,尽管存在对二十国集团合法性、效率及有效性的质疑,但这是任何新的国际合作形式均会面临的问题,二十国集团自其 1999 年成立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并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赢得更大影响力。不可预估的新的经济秩序可能会出现,其中传统的国际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只能在由二十国集团所提出的新兴国家和区域战略的发展框架下起到有限的作用。二十国集团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积极调整二战后出现的国际金融机构,同时弥补他们的不足。在这一点上,二十国集团目前仍然是应对由全球多极化所带来复杂国际形势的最佳对话机制。